

◎央行理事会由蒋介石政府特派理事 11 至 15 人组成 其中工、农、商、财政、银行界人士至少各有 1 人 再由蒋介石政府在这 11 至 15 人中指定 5 至 7 人为常务理事。

关汉卿在《望江亭》中说“雨里孤村雪里山 看时容易画时难”国民党金融帝国的各种隐情 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构成这一金融帝国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金库这“四行二局一库”中 中央银行居于中心地位 是国民党金融体系的重中之重。

1927 年是蒋介石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4 月 他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紧接着又在二次北伐中 攻占北京 旋即使东北四省和平易帜。

这时候的蒋介石可谓雄居九五 横扫六合 权倾华宇 力布四方，事业发展不可阻挡，政治生命到了最辉煌的时刻。

在汹汹之势下 他也不失一份冷静：“军事一统端赖政治一统，政治一统端赖经济一统，经济一统端赖金融一统。”

凡此诸一统 至今仍无一全面完成 他怎不心绪不宁？

他知道 要维护政治军事权力 就必须掌握两个法宝 两者缺一不可：一是军队 二是发行钞票的银行 即中央银行。

建立中央银行是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第一步。

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体系中的中央银行 是指 1928 年 11

月在上海成立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它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统一发行兑换券、经理国库、经募政府公债等特权。同时又是“银行的银行”，领导和管辖着所有商业银行。

这是国民党政治焦点的中心，是国民党政权的金融枢纽，是蒋介石金融帝国的中心，是国民党各派系争夺的中心。

中央银行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它在金融界的核心地位，使之与自己的政权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为豪族集团手中得力的金融工具。

在这以前，1924年在广州，1926年在汉口，国民党都成立过中央银行，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基础，都旋生旋灭，没有形成气候。

真正得以纳入日后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金融体系的，是蒋介石一手策划成立的中央银行。当时总行设在上海，抗日战争时期迁移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到上海，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中国人民银行所接管。前后历时20年零6个月，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代表着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整个过程。

蒋介石建立中央银行的思路由来已久，实际上，早在他建立南京政权前后，就开始设计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在他眼中，中央银行应该是自己的“钱袋子”，应当是自己予取予用的金融工具。

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旧事：

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将蒋介石与秦末农民领袖陈涉相比，难尽情理，但其失败倒是

有几分相像 轻薄待客 而重用私人 如陈涉之用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为蒋介石具体建立中央银行这一金融机器的主要功臣是宋子文。

宋子文，1894年出生在上海，青年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 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财经 获博士学位 曾在纽约银行见习。回国后先在汉冶萍公司任英文书记（秘书），后在上海担任过联华商业银行副经理和神州信托公司副经理。此后他还经营过五金生意和炒卖过股票，但均失败。

有了这样的金融活动背景和能力，他就成为国民党主要政要注意的一个人物。其显赫的家族背景自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宋子文跟随孙中山去广东，先任广东革命政府秘书，后管理过盐务 筹划过财政 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委托他创办中央银行 并担任行长。

孙中山逝世后 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愷遇刺身亡 宋子文深孚众望，接替了财政部长一职，成为新政权的主要经济官僚。

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前身正是广东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中央银行，宋在日后国民党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就是在此时开始奠立的。

早在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就委托宋子文草拟有关中央银行的规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蒋介石于 1928年和宋美龄结婚 宋子文和蒋介石便成了郎舅，他由此更成了蒋介石须臾不可或缺的经济人物。

家族、精明以及由此而来的众技术官僚的拥戴 使他的经济事业开始如日中天，并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而由广东一隅迅速推至武汉、南京、上海……

1928年6月，南京政府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同年7月

又在南京举行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由工商界和部分经济学者组成，财政会议则由国民党政府中央和各省负责执行财政规划的行政人员组成。

宋子文在会上并没有像以后那样张扬外露，但却是这两次会议的幕后策动者。

各方商贾名士接踵而至 纷纷为新国家筹划开国经济方略 这对仍骑在战马上东征西讨的蒋介石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次会议对制订财政、金融、货币等方面的基础规划 提出了初步方案 明确表示要实行币制改革 统一全国货币 推行纸币，实行金本位汇兑。同时，正式提议应尽早成立中央银行。

当时宋子文任财政部长 在经济和财政会议后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 他具体负责中央银行的建立工作 为此费了不少的心思 也在蒋介石面前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经济组织才能。

1928年10月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 宋子文组织了一个金融专家班底 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央银行章程》 并由南京政府正式颁布。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 中央银行于 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外滩 15号 即帝俄道胜银行旧址 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后 苏联政府交还给中国的。

从此 这里成为国民党政治、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

对于中央银行的组成人员，蒋介石和他的圈内人是很费了一番脑筋的。

为了防止金融大权旁落 中央银行总裁人选为特别任命 这在当时并不让人意外，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成为中央银行的“当然”行长。

中央银行建立之初 副总裁只设一人 阴眼人可以看出 这也是因人设职 在宋子文的力荐下 其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陈行担任副

总裁。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原来的章程也就成了一堆废纸，副总裁改设为二人。

按照章程规定，总裁综合负责全行事务，副总裁负协助之责，任期均为三年，期满可以继续连任。这为宋子文长期身居金融要职扫清了政策障碍。

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副总裁外，还要有一点装饰。要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为蒋介石偿还人情账，要将其他有影响力的金融组织纳入中央银行控制体系，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可用之才”。这一组织形式便是中央银行理事会和监事会。

理事会由蒋介石政府特派理事 11 至 15 人组成，其中工、农、商、财政、银行界人士至少各有 1 人，再由蒋介石政府在这 11 至 15 人中指定 5 至 7 人为常务理事。

理事会最早的理事有宋子文、陈行、叶琢堂、周佩箴、王宝伦、钱永铭、陈光甫、荣宗敬、周宗良等，前 5 人为常务董事，均为商界大员，可谓名贾云集。

当时的中央银行名义上规定理事会是银行最高决策机构，总裁执行理事会决议，业务方针、预算决算、资本扩充、各项规章制度、兑换券发行数额、准备数额、国内外分支行及代理行的设置和裁撤等重要事情决策都应当通过理事会。

蒋介石如何才能让自己控制理事会呢？

尽管他对金融可以说是外行，但对政治玩得炉火纯青的蒋介石总能想到办法：理事会主席由总裁担任。

这也是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的一个典型特色。

道理不难理解，宋子文兼常务董事，并任理事会主席，集立法、行政权于一身。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人大多为宋或蒋的亲信，蒋介石自己不出面，通过宋子文就牢牢控制了中央银行主导权。

监事会是装点门面的虚设机构，有监事 7 人，由实业界、商

界、银行界各 2 人 审计机关代表 1 人组成。监事会主席由监事相互推定 监事会的职权为稽核全行账目 检查发行准备金和审核预算决算。

其最早成员有李铭、虞洽卿、贝祖贻、徐陈晃、林康侯、秦润卿、李毅臣等，李铭为第一任监事会主席。

在蒋介石看来 新的中央银行领导层组成是较为合理的 至少比广州、武汉时期要好得多。尽管此后具体人员不断发生变化 但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并无根本变化，这是蒋介石颇为自得的。

中央银行成立时银行职员大约有一百多人，基本是为南京政权建立效过犬马之劳的江浙财团要员所荐。

这时，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央银行得以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央银行走向败亡的伏笔。

按照宋子文的设计，《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 享有统一发行兑换券、铸造和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及经募政府公债等特权 同时又是“银行的银行”领导和所有商业银行。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开张时资本总额为 2000 万元 由国库一次拨给 2000 万元的“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 总行设在上海，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行。

当时规定中央银行具体业务范围包括：经营国库证券及商业票据买卖和贴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调剂金融市场、接受存款和以金银为担保的贷款、代理收解各种款项、保管证券贵重物品等。

可以看出 尽管此时中央银行并不大 但已经为日后的扩张提供了政策上的准备。

在组织层次方面，中央银行采用总行制，对外营业单位有业务、发行、国库三个局 管理部门有秘书、稽核、经济研究、会计和人事五个处 处与局平级。

1935 年设立中央信托局，初办时对内仍为中央银行所属的一个局，1946 年起改为完全独立单位，但仍受中央银行控制，信托局理事会主席仍规定由中央银行总裁担任。

后来，中央银行又成立了一个棉麦处，受财政部的委托，办理棉花、小麦、面粉等实物的接运安排以及储藏转卖等事务上的手续。

总行各局、处权力很大，对外及对内凡有关业务问题，都可直接行文，发布指示。

中央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业务局和发行局，与之相应，这两个局也是掌握权力最大的。

业务局是对外营业的第一局，除办理总行业务外，还负责监督各地分、支行业务。其主要业务为国库存款和买卖公债。当时国库存款来源主要是关税和附加税。公债买卖是受财政部委托，并委托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办理，每天从开盘到收盘涨落的差价作为该局的一笔收入。

发行局是中央银行对外营业的第二局，其主要业务为：发行更换券和辅币券；接运国外订印的钞券，加以盖印签章；保管准备金及钞券的现金兑现等。

中央银行成立时，钞票是早就在美国钞票公司印好了的，发行局派人到中华书局印刷厂加印签字。正面是两个红色小方印——总裁之印、副总裁之印，背面是发行局总发行和副发行的黑色英文签字。

当时业务局的总经理是顾贻穀，发行局的总发行是李觉。

有人说此二人能够在中央银行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是财政部两个次长在平分秋色，在竞争中权力分配的结果。

顾贻穀是江苏银行出身，是财政部次长张寿鏞的亲信。李觉是常州系，当过北平大陆银行副经理，后来到了广东，成为宋子文筹

组中央银行时的总稽核 财政部里面有好多人是常州人 其中财政部另一次长是主要召集者，李觉正是他的堂兄弟。

由于当时钞票发行尚未统一 除中央银行外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其他一些商业银行也发行钞票。所以 中央银行所发钞票信用不够统一。

中央银行在一般省会经济中心都设有分行 分为一、二、三等行 总数量最多时近 70 处。总行直接控制的只限于一等分行及设有专用电台的二等分行。三等分行由一等分行管辖 它的业务限于处理收税及汇解军政款项。

中央银行建立之初 就显示出了与其他银行的特殊之处 不仅办公环境大相径庭 就是办公设备也高人一筹 总裁与各主要局处主管之间 经常用对讲电话联系 工作效率似乎颇高 这也是当时的一道风景线。

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初，与财政部是平级的，而且基本合二为一 相互制衡以致矛盾的方面并不突出 财政政策 and 金融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因为在宋子文、孔祥熙时代 财政部长都同时兼任中央银行总裁。

但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经过对孔、宋等人的观察 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以前将财政金融完全受之于一个人的做法 转向实行分而治之 因而 以后很少出现中央银行总裁与财政部长互兼的情况。

在金融方面 蒋介石对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分工是 财政部主管金融行政 如银行钱庄的设立与撤销 货币金融制度的制订与修改 而关于业务经营、资金的调拨、外汇的统筹、金融市场的管理和调剂，都由中央银行负责。

1933 年，一直受到信任的宋子文因过分自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他苦力支撑 使蒋介石“开国”之初财政金融成绩不菲 但

仍因和蒋介石意见不合而让出位置，由孔祥熙接任。

据中央银行档案记载，1933年3月5日宋子文致电胡笔江，告之自己已经于当日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消息，原电如下：

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仍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寿民、孟嘉两兄为禱。弟子文，歌。

当时胡笔江、唐寿民、胡孟嘉都是宋子文的主要亲信。他叫中央副总裁陈健庵转告他们，一切仍照原定计划进行，说明宋开始时还没有辞去财政部长的意图。

另据同日财政部次长徐堪致陈健庵电可以佐证。

徐电中讲孔祥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是由宋子文请汪精卫保荐的。

徐电文如下：

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在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至仍然继续要求增加经费。请转告馥荪、公权、淞生、孟嘉诸兄为禱。弟堪 歌。

徐电报说明了宋辞职的原因，表面上是财政经费问题。此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极大，要求对中央银行的金银予取予用，遭到宋的部分抵制，争吵时有发生，矛盾越来越大。孔对蒋向来是顺从的，由孔代宋，当然是蒋的意思。

但宋子文官运不衰，后又担任过行政院长、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驻美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1945年联合国大会成立时还担任了中国首席代表。

宋子文1933年初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虚职，但他并不想丢掉自己苦心经营的金融阵地。一向颇为自负的他私下曾对密友说：“老蒋不让我干中央银行，我就

再造一个中央银行给他看看！”

他深知当时国民党正在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批建设资金，于是将政治上的失意转向对商业银行的兴趣，在中央银行之外另起炉灶，筹划成立了一家新型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公司。

这一消息最先是 1934 年 4 月从莫斯科传出的：宋子文正着手建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经办外国人投资，已聘请了国际金融专家拉西曼和马虚为顾问。

这年 4 月 15 日，上海的《申报》发表文章说：“以 1000 万元之资本合组银公司问题，更已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氏予以证实”；“盖该公司系专以沟通我与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也”。

6 月 2 日，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上海九江中路 111 号成立，资本 1000 万元。其中发起人为宋子文、宋子良兄弟等 26 人，每人认股 185 股，共 5000 股，每股 100 元，合计 50 万元，其中宋子文兄弟认股 370 股，资本 3.7 万元。其余 950 万元分别由中央、中国、交通、金城、中南、大陆、上海、浙江兴业等 17 家银行认购。

宋子文的气魄是够大的，他成功地以蒋介石无法拒绝的方式，给了抛弃自己者以明确的信息：没有中央银行的金融垄断地位，我照样可以用商业运作的手段达到同样的目的，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不买我账的人并不多。

在这种经营气魄下，宋子文最初被推举为董事，后来干脆担任了董事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当了总经理。

如果说在中央银行时，宋子文的权限还受到一定制约的话，在中国建设银公司，宋子文几乎是说一不二的。

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通过对一些大的工矿建设项目的投资，公司势力扩大很快。1936 年，宋子文以建设杭州至宁波间铁路的名义，向英国的中英银公司和汇丰银行借款，并包揽杭州铁路的

建设资金。1937年又为建设广东、江西、四川等地铁路贷得一笔外资。在工业方面，他向南京政府重点建设项目陕西的京西电厂、苏州的成金煤矿、四川的建川煤矿、陕西的铜川煤矿、湖北的既水瀑公司、安徽的淮南煤矿、南京的扬子电气公司等进行投资，利润回报颇丰，引得不少金融家啧啧赞赏。

据 1936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资产负债表》，该公司资产总额合计为 3283 万余元，这年纯收益（利润）为 191 万余元。“抗战”期间中国建设银公司一度迁往香港，“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的建设大厦内，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名声愈显，成为金融界人士的重要谈资。当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称它为“华尔街的买办机构”，因而它受到国内舆论界的众多攻击，这位卸任央行总裁也开始感到压力。

事情做得太大，频繁出没于各大银行和金融权贵之间，蒋介石也对宋子文心存疑窦，对宋控制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很不放心，不仅担心宋的所为会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影 响，也担心会对中央银行的正常业务产生冲击。

在一次谈话中，蒋介石郑重向宋指出：“别人都指摘豪门资本，如中国建设银公司等，你以为如何？”

宋子文的回答倒也颇为利索：“如果你觉得可能有问题，我捐出来好了，反正都是为了‘党国’，只要能回归国家，用得其所，我有何憾？”

这次谈话后，宋子文竟“慷慨”地给了国民党政府一部分股票，这是当时很多人所未曾料到的。

既然宋子文给了自己一个应付外人的台阶，蒋介石就马上开始用起了政治方术。

在 1947 年 6 月国民党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为宋子文解脱说：“宋子文已经捐产 2000 亿元”。于是，上海、南京等

地各报曾一度盛传宋子文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财产都捐出来了。

但这显然是一个骗局，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清楚。

1948年上海经济资料社编的《TV 宋豪门资本内幕》一书指出：“实际上献产并不损害他对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掌握与控制，其所捐股票为中国建银的 35000 股及其在各公司的股票。目前银行股票为 75 万元，票面百元，升 7500 倍”，“2000 亿元约合‘抗战’前 300 万元，在中国建银所占股权不过 1/40，也不影响他老弟宋子安的总经理，如此建银仍然牢牢掌握在宋家手里，而且可以抗御一切指摘与攻击”。

看来，宋子文在金融上可以蒙住蒋介石，却没办法蒙住所有人。

通过捐产暂时平息各种议论后，宋子文继续发展他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同时，他觊觎巩固自己在其他商业银行的大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把中国银行总行南移上海，但国民党政府资本为 500 万元，仅占总股本的 1/5。中国银行信誉好，经营得当，一直保持着中国最大的银行地位。1934 年中国银行金银比中央银行多 50%，存放款各多一倍，钞票发行多两倍半。

中央银行经营不善，并不妨碍宋子文在中国银行有所作为，因为他不仅有精明的经济头脑，更有强大的政治后台。

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宋子文和孔祥熙经密商，提出由国民党政府向中国银行增资 2500 万元的动议，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

尽管遇到抵抗，但事情进展并不是很困难。1935 年初，宋子文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增资扩股的目的。中国银行原有资本 2500 万元，其中原有官股 500 万元，再增官股 2500 万元后，官股一下增至 60%，其性质也由商办变成为官办，董事会也进行改组。

这年 4 月，由孔祥熙提名，宋子文当了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推

荐宋汉章当总经理 宋汉章先推辞 由宋子文兼任总经理数日 后仍由宋汉章出任总经理。“抗战”期间由孔祥熙担任董事长 但中国银行的实权一直在宋子文手中。

“抗战”前宋子文还收买了广东银行 将之置于宋家直接控制之下。

广东银行原是美国华侨投资，成立于 1913 年 2 月 资本 200 万港元，1926 年增资至 820 万港元，1935 年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而亏蚀倒闭。

1936 年 宋子文看准机会出面收买 并对之进行投资改组。改组后的广东银行资本为 870 万元 分为第一优先股 200 万元 第二优先股 4678520 元，日股 普通股 1083200 元。

宋子文私人投资仅 20 万元 但他的弟弟宋子安担任了董事长要职。

该行在“抗战”前由于经营侨汇和进出口押汇业务 赚了大钱，到 1947 年时资产增加到 8000 万港元。据当时报载：“这个广东银行，‘抗战’前在广州等地吸收存款，‘抗战’爆发后一律停业 而存款则被宋家运用来买外汇 存款人前往取款 以账册不全拒付 战后则以一偿一”可见 宋家从中谋取了大量财富。

除此之外，宋子文还插手其他金融机构，在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都有投资。

信奉实力的宋子文太清楚同样信奉实力的蒋介石了，只要有实力，不怕自己没有重新出掌中央银行的一天。

虽然一时丢了中央银行总裁，但他在其他金融组织的影响非但没有缩小 反而日趋扩大 这些金融活动都为宋子文日后重掌中央银行奠定了基础。

由宋子文任第一任总裁的中央银行从成立到 1949 年 5 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派员接管，在这 20 多年时间内，控制

着全国的金融，对蒋介石政府的财政经济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是豪族集团控制社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豪族集团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阵地。

中央银行的发展史，就是国民党政权发展史的最好浓缩，其间发生种种奇端异事，就是国民党政权从产生、发展到衰亡过程的若干浓缩点。

⊙新银币于同年正式铸造，一面有孙中山头像，另一面有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原定这年 12 月正式宣布实施币制改革，但自 10 月下旬起，市场纷纷传说中国货币要贬值，中、中、交三行的纸币将停止兑现等等，引起市场恐慌。标金（旧中国标准金条的简称，含金量 99%）飞涨，汇价大跌。

中央银行成立后，蒋介石集团就开始了构筑自己金融帝国体系的步骤。

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利用其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特权，逐步开展业务，增强了它的实力，加强了它的基础，初步把民国货币金融方面的混乱局面，逐步统一和安定下来。

与其他银行不同的是自己的特权，是国家政权对自己的特殊政策支持，这是中央银行主持者非常清楚的道理。

在这一阶段，中央银行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支持下，在金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有关金融和货币方面主要有以下步

骤：一是实行废两改元，把混乱的银本位制统一起来；二是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制，改为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摆脱了因白银价格波动对中国货币的影响。

这是中国金融制度的两项伤筋动骨的动作。

在这些改革中，中央银行曾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来华协助。例如 1931 年曾邀请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教授甘末尔及其一行来华，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甘末尔委员会的货币改革方案。其次是 1935 年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协助进行法币改革。

甘末尔主张采用金本位制，这种制度在当时虽然是全世界通行的，但中国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条件。至于法币改革计划，原来是由中国人草拟制订的，李滋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协助和推动作用。

废两改元是中央银行为彻底整顿金融走出的一个重要步骤。

当时，展现在中央银行负责人面前的形势是：我国疆域辽阔，长期以来地方军阀割据，往往自行铸造货币，印发纸币，币制极为混乱。辛亥革命后，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银两已不再通用，而为银元代替，但在商业往来和国际收支方面仍大都用银两结算，因此，在市场上，出现元、两并用的局面，一方面要用银元掉换两作为记账单位，一方面又要用银两掉换银元在市面使用，不仅收付不方便，而且辗转折合、贴水、时涨时落，投机商人从中渔利，严重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意识到币制不变是不行的。

当然，废两改元并不是中央银行的首创。

首先废除银两制度的是江西商人，接着，在厦门、宁波和奉天等地商业往来中相继改用银元计算。后来，上海商会通函各业及长江流域一带各商会，倡议一律改用银元，并向民国政府建议改用银

元为本位。

废两改元成为一种时尚 国民党政府一度欲禁不能 欲放又怕出问题 一时非常被动。

在各地废两改元活动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决定开始启动改革政策。

1928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正式提出实行废两改元，后经 7 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通过 设立南京政府直辖的造币厂统一铸造银元，计划于 1929 年 7 月 1 日在全国施行。

这是废两改元的第一步 后来由于一些钱庄业的反对 未能马上实现。

其主要背景是 上海银钱两业一向有“废两改元”和“两元并用”之争。

秦润卿是反对“废两改元”最力的。

秦润卿 名祖泽 号抹云老人 浙江省慈溪县人 上海早期钱业领袖。1920 年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 其后连任四、五、六届公会总董 七、八、九届公会主席 主持钱业公会近 20 年之久。他还曾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中国垦业银行总经理、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可见其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927 年 3、4 月间，江浙财团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时 秦润卿作为钱业公会负责人 与陈其采、虞洽卿等 15 人同为委员。

对于蒋介石政权 他是有功的。他所主持的上海钱业公会曾为蒋介石夺取政权提供了 100 万元巨款 此后在 1927 至 1935 年还向蒋介石政权提供借款和认购所发债券达 2900 多万元。

这期间，秦润卿作为钱业代表，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等职。

1932年初，废两改元之议再度兴起。钱业公会一方面深知统一币制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由于本身利害关系，仍竭力挣扎。同年7月钱业公会集会表示“原则赞同，惟需假以时日”随即向国民党财政部正式提出意见，并由秦润卿发表谈话，申述缓行理由。

1932年夏，上海洋厘银元折合银两的市价跌至六钱八开，创元、两并用以来的最低纪录，银元被大量熔毁，金融形势异常紧张。

于是，蒋介石政府又旧事重提，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组成废两改元委员会，决定在3个月内完成。

上海钱业闻讯后，立即召开会议，致函财政部，原则上表示同意废两改元，但仍力争推迟实施时间。

有了以前的教训，废两改元委员会不加理睬，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1933年4月5日，南京政府财政部出面正式发布《废两改元公告》，明确规定从1933年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

从此，南京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废两改元行动。

废两改元之后，中国货币流通在法律上进入了银本位时期。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26.691克，成色88%，含纯银23.493448克。

在中央银行的操作下，新银币于同年正式铸造，一面有孙中山头像，另一面有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这次废两改元，有利于商品流通，也有利于中央银行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控制，为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打下了基础。

在废两改元的策划中，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起了主要作用，但不得不将光环让给他的对手孔祥熙。

在《废两改元公告》发布后，宋子文被迫于1933年4月5日辞